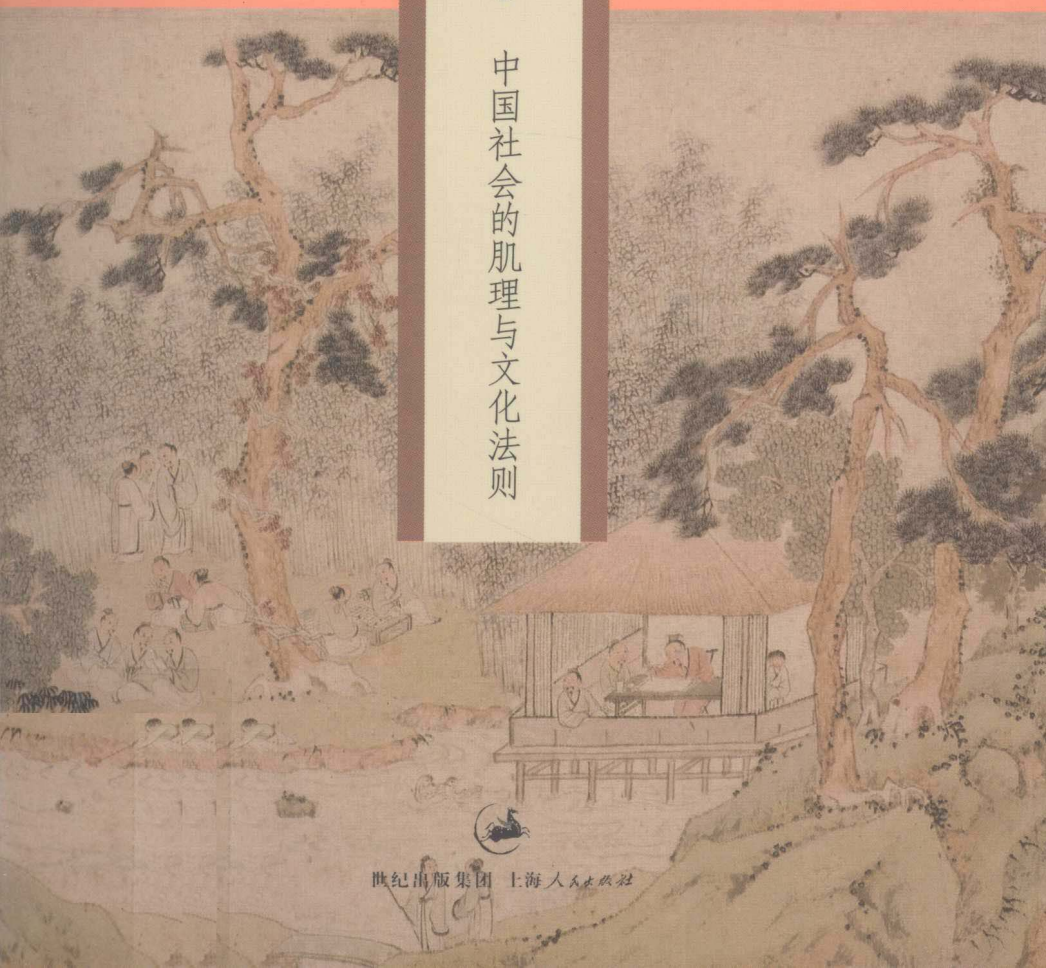


思想
与社会 ICARUS

文化符号学

龚鹏程 著

中国社会的肌理与文化法则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思想
与社会 ICARUS

文化符号学

中国社会的肌理与文化法则

龚鹏程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符号学：中国社会的肌理与文化法则 / 龚鹏程
著. —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ISBN 978-7-208-08143-7

I. 文… II. 龚… III. 符号学 IV. H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49960号

责任编辑 何晓涛
装帧设计 张 布



世纪文景

文化符号学：中国社会的肌理与文化法则
龚鹏程 著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出 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55号4层)
发 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 毫米 1/16
印 张 28.25
插 页 2
字 数 389,000
版 次 2009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09年1月第1次印刷
I S B N 978-7-208-08143-7/G·1274
定 价 36.00 元

目 次

大陆版序	1
再版序	3
自序	5

第一卷 文字、文学与文人

第一章 中国文人传统之形成：论作者	17
一、何谓“作者”？	17
二、两种作者观	19
三、神圣性作者观	20
四、作者之谓圣：孔子的地位	24
五、述者之谓明：儒家的性格	26
六、由述者到作者的转换	30
七、作者观在汉代的发展	33
（一）确定原本的学术路向	33
（二）探寻本义的解经传统	33
（三）公羊家作者观的普遍化	34
八、作者的世俗化：文吏与文士	36
九、创作的新传统	40
（一）创作活动的改变	40
（二）哀怨精神的崛起	42
（三）阅读之目的与方法	43
十、余论	46

第二章 中国文学艺术发展的结构：说“文”解“字”	52
一、诗是艺术最高的发展	52
二、乐与礼：艺术中心的转换	55
三、从歌词到文词	58
四、由曲艺到诗剧	62
五、由描摹到书写的艺术	65
六、文字、文学与文化	69
第三章 文字艺术中的辩证：由张怀瓘书论观察	80
一、独立的书法评论家	80
二、笔法论的形成与发展	81
三、书法：文字艺术的规范	85
（一）书法的文体论	85
（二）书法的体要观	88
四、艺术对文字的反抗	90
五、自然无为的创作观	93
（一）法道无为	93
（二）灵感神遇	95
（三）天资偶发	96
（四）学至无学	98
（五）心契冥通	99
六、知音冥契的鉴赏论	101
（一）形神	101
（二）言意	102
（三）知音	104
（四）文质	105
七、历史关键时期的书论家	107

第二卷 以文字为中心的文化表现

第一章 深察名号：哲学文字学

——中国哲学之主要方法与基本型态	119
一、专论字义	119

二、正名之学	122
三、说文解字	124
四、深察名号	126
五、望文生义	129
六、哲学文字学	132
第二章 以文字掌握世界：有字天书	
——中国宗教（道教）的性质与方法	139
一、自然创生的天书	139
二、虚无气化而成文	143
三、文字为文明之本	147
四、以文字掌握世界	151
五、道教信仰的核心	153
六、道门文字教	159
第三章 文学的历史学与历史的文学：文史通义	
——中国史学对历史写作活动的思考	169
一、知难之叹：不被世人了解的章实斋	170
二、推原官礼：实斋文史学的基本架构	175
三、讨论流别：实斋论校讎的主要精神	179
四、以遵王制：实斋学中的权威依附性	183
五、述而不作：实斋反历史主义的史观	187
六、即文是道：书同文以治天下的理想	195
七、成一家言：言与所以言的复杂关系	201
（一）修辞立言	202
（二）立言有本	206
八、自号实斋：对实至名归社会之向往	210
九、文史别论：刘知几《史通》论文史	213
（一）文与史的分合	214
（二）文学的历史观	217
（三）尚礼的世界观	221
（四）与时代文风的关系	224
十、叙述史学：对历史书写活动的思考	227
十一、文外之言：文字传写外的口说传述	233

第三卷 文字化的社会及其变迁

第一章 文学崇拜与中国社会：以唐代为例	257
一、进士登第如跃龙门？	257
二、进士科受尊崇的原因	260
三、进士科举与文学崇拜	263
四、文学崇拜诸现象	267
五、朝廷对文学崇拜的态度	271
六、社会对文人的供养	275
七、由文学到反文学	280
八、反文学以昌大文学	285
九、“道/艺”“文/教”之间	290
十、社会生活的文学化	297
十一、社会阶层的文士化	303
十二、文学权威之神秘化	308
十三、文学社会的形成	314
第二章 儒学、史学与文书政治	333
第三章 文字传统的解构与重建	
——新文学运动对中国文化的冲击	340

第四卷 文化的符号与意义

第一章 传记小说的新思维	355
一、传记小说	355
二、言说系统	356
三、文的优位	358
四、虚实之间	361
五、历史文学	362
第二章 汉语文化学的历程	366
一、为抚陈编吊废兴	366
二、谄言诂字似秋蝇	367

三、凿光欲借西邻火	370
四、呼渡难期夜客磨	373
五、沧海已随人换世	376
六、鸬鹚相化水成冰	379
七、老夫尚喜不知闹	382
八、能说桃花旧武陵	385
第三章 语言美学的探索	390
一、语言美的研究	390
二、对形式的关注	393
三、探索法的原理	395
四、文体的本色	398
五、象征的体系	401
六、意义与结构	406
七、抒情的辩证	409
八、文化的关怀	412
第四章 语文意义的诠释	415
一、因言以明道	415
二、语言的分析	418
三、理解的迷失	422
四、客观的考古	425
五、反省的路途	428
六、诠释的方法	432
附录 德里达哀辞	440

大陆版序

谈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谁都明白儒道释三教乃其骨干，脱离三教而论之，便成蹈虚。但仅说三教，其实仍是不够的。虽然当今之世，求能通晓三教者，殆已难觅其人。然三教之外，中国却还有两大传统是不能不予掌握的，那是什么呢？一是文，二是侠。文是由文字崇拜、文人阶层、文学艺术等所形成之相关文化状况；侠是由侠客崇拜而造就的社会肌理。不知此，即不能体会中国人的行动、思维与感情，亦不能切察中国社会之底蕴。犹如不知武士之历史、阶层及精神就不可能了解日本，仅知基督教而不知骑士制度与传统，即不能深入欧洲的文化那样。欲明中国，须知五教：儒、道、释、文、侠。

五教关系不是分立的，彼此参互交摄，文在其中。文极重要，却最难理解。外国人无独立的文字体系，固然难以理会；中国人百姓日用而不自知，也如每天虽呼吸着空气而不太会注意到。故说的费劲，听的狐疑，需要我从各个侧面来反复介绍之。

详细的解说，略具于本书中，读者开卷自知，无待赘述。这里要简单说说的，只是这本书的身世。

此书身世亦不离奇。只因我对儒、道、佛、侠诸传统都曾有所论析，对影响吾国极为重要的文字教，自然也就不敢轻忽。尝由文化美学角度作《文化、文学与美学》，由文学社会学角度作《中国文人阶层史论》，由文学艺术角度作《中国文学史》等，通释其要。本书亦为其中之一端，初版于1992年（台北：学生书局），是想通过对中国文字符号的解析，指向对文化传统之诠释的。

原编三卷，一论文字、文学与文人；二论以文字为中心的文化表现，如史学、哲学、宗教等；三论中国这个文字化的社会。所涉面相，颇为庞杂，所论事类，甚为丛脞，但整体方法与观点是一致的，即以一种文化符号学的

方法去讨论中国的文化及其符号。

文化符号学，中土夙少名家；或有治此学者，亦以转述稗贩为主。唯我蹊径独辟，并将符号学与诠释学打通起来。不但视宇阔开，且足以与西方当代学术发展相对观，故我自己对此书是比较珍重的，自以为有开辟之功。曾有评者认为我的作法类似高友工先生的“抒情美学理论”，是企图建构一种中国文学艺术的（主导了民族精神形式显现、意义格式化的）文化逻辑或主导精神。这点我不反对。但若说我所谈的“实质内涵，不论就审美理想还是价值理想，同于高友工所说的抒情传统”，则甚不然。我并不赞成其说，我所说亦要高迥复杂得多。事实上，就连符号学或诠释学这样的名称，恐怕亦不能涵括本书之义蕴，这是要恳请读者诸君留意的。

2000年，此书再版，仍由台湾学生书局印行。我又补了一卷，论文化的符号与意义，希望能从更多的角度来补充这个论题、丰富这个方法。2004年应北大蔡元培、汤用彤学术讲座之邀，则另讲了文字之外的“象的文化符号学”，以及文字与言、象、数诸符号体系的关系，头绪粗明，尚待引申，故不复纳入本书。

这次刊行大陆版，多亏了何晓涛兄的细心检校及核实文献。本来想再辑补第五卷，计划收的文章是：一、《汉字：由面对欧洲中心论到面对全球化》（原收入《北溟行记》，2005，台北：印刻）；二、《简难：繁简错杂的大陆社会》（2007，第二届台北汉字文化节论文）；三、《简化字大论辩》（原收入《时代边缘之声》，1991，台北：三民）；四、《鲁迅对中国小说史的诠释个案研究：“小说文学”学科建立的精神史》（原收入《近代思潮与人物》，2007，北京：中华）；五、《论文人书法》（2007年2期《励耘学刊》，北师大）。不过由于原书篇幅已多，后来终究放弃了再予扩充的想法，仍维持四卷本的规模，只在末尾增列了一篇附录：《德里达哀辞》。2004年德里达逝世，友人王宁于北京清华大学置酒追悼之。我昔年写这本书，曾受启发于此君，故临席致哀，略述渊源并小论其得失。附录于此，或可使读者约略仿佛前文所谓足以与西方当代学术发展相对观的意义。

再 版 序

国内治符号学者，盖甚寥寥。近年论者渐夥，然鹦鹉学舌，妙谛无多。本书在其中，性质便显得比较特殊。衍吾国“名学”之绪，探传统文化之贻。昔年曾以此自喜，以为生面别开。如今八年以还，学界于此，苦乏赏音，亦未闻有嗣响者，令我振衣高岗，颇有不胜孤寒之感。不料如此默默地便将书售完了。三十余万字的书，有这么多人买了去看，赏音岂可谓少？这又颇令我惊异台湾学术的生机毕竟是不可小觑的。

这本书，如我在原版自序中说的，旨在说明中国语文与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的内在联系，故由对文字符号的解析，指向文化传统，进行文学与文化批评。一方面建构一个新的符号学规模，一方面则以此符号学来展开我对中国“文字—文学—文化”一体性结构的总体解释。所以原分为三卷：一论文字、文学与文人；二论以文字为中心的文化表现，如史学、哲学、宗教等；三论中国这个文字化的社会及其变迁。

在这个脉络中谈符号，符号当然不会是孤立的。对语言文字符号本身形义音声及组织结构的讨论较少，而重在说明这套符号系统如何在社会文化中起作用，这个社会何以有此符号，此符号又如何建构这个社会。当代谈历史、社会、文化者，多不娴文字名言训诂之学，论哲学者又不谙具体社会情状，因此我这类说明其实是不可少的。

写这本书时，我还在“陆委会”供职。如今，世事流转，我业已由“陆委会”而南华大学，而佛光大学。书，也已再版了。岁月既增，书当然也该有些增订。原书三卷，现在补了一卷。以后若读者还有兴趣再看，我再继续增补之。囊底之智未竭，这个论题也谈不完，所以尽可再补。

现在这一卷，是谈文化的符号与意义。第一章，论文字与语言两种文化符号，牵连及于文学与历史、虚构与真实、传记与小说间关系的再思。第二

章，论汉语文化发展的经过，迻了一首七律作为回目，叙述语文学从历史面到社会面再到文化面的发展情形，并附评议。此种文字，成如容易却艰辛，未可为不知者道。第三章，是第二章的一个补充，谈台湾语言美学的探索，并以我自己的研究为例做一分析。旧编有《美学研究在台湾》，较偏于生命美学一路的说明，本篇也可视为该书之补论。第四章，沿续第三章，从语言层面进而探讨意义的问题，顺便清理一下近代方法学史，故由戴震谈起，论如何才能因言以明道。欲从学者勿执泥于筌蹄而达径亡羊也。书不尽言，聊为以此示意，知者鉴之。

2000年9月15日记于佛光大学

自序

这部书稿，旨在观察中国的文学与社会文化，且每篇文章都使用着由语言文字符号去了解文化的方法。全书也旨在指出：构成中国文化的整个社会生活领域，事实上都处在中国文字符号系统的组织和制约中。因此，友人蔡英俊建议我将此书命名为“文化符号学”。

我知道他拟想此名称时，是从近代西方学术发展史上得到灵感的。因为这种文化符号学的方法，一般以为肇端于维柯的《新科学》。

维柯认为：人类认识中所谓的真实，其实是他通过自己的观念和语言所构造的一种真实。故古人之神话，乃以隐喻之方式去描述其所知见之世界。这些神话不应看成是古人荒唐无稽或原始落后的征象，而应视为古人运用隐喻思维（或称诗性思维）所建立之符号系统。此说不仅指出了研究神话的方法，更动摇了我们对语文的一般见解。一般人总把语言文字视如斧头钳子般的工具。但维柯以后的语言哲学，却觉得语文不只是工具。人必须透过语文方能论述这个世界；不同的语文传统，所理解和叙述的世界即不相同。因此，语文提供了人类认知与解释世界的基本范畴，也影响到人类所有的思维与文化表现。我们所身处的世界，乃是我们自己运用语文构成的世界。故只有深入解释语文，方能解释社会。这种新的见解，影响深远，在近代西方学术发展史上，早已非一家一派之私见，而是一种广泛的学术倾向了。所以语言研究，不仅为当代诸多哲学课题之一，且已成为哲学的基础、方法，并具有近乎传统哲学中形上学的地位了。

我的研究，在方法和趋向上，与上述西方近代学术之发展有并驾对观的意味，故将本书名为“文化符号学”，甚为恰当。但我之为此，有特殊的感怀，手眼心力，颇不同于西洋符号学的传统，似应再予说明。

案，符号学，旨在讨论人类运用符号之方法与过程，符号的性质及其指

涉等问题。举凡语言、文字、聋哑者之手势、电报、旗语、音乐、宗教仪式、祭典、服饰、亲属系联等符号系统，皆在其讨论项目之列。或称为记号学，或名曰形名学。由于人类所使用的符号系统，以“语言”最复杂、最完整，故符号学的研究，实以语言学为根本基石。透过对语言的研究，形成一些基本观念，再推拓及于其他符号系统，逐步建立一个讨论一般符号的理论体系，用以分析人类各种符号之构成与运作。

这种学问，若放在中国的学术脉络中说，则当称为“名学”。

正名，虽然是先秦诸子共同的主张；建构成为一门学问，专门探讨名的性质、指涉及使用状况，则有名家一派学者专门致力于此。名家对名的辨析，后来因太过繁琐而遭到攻击，谓其“碎义逃难，致远恐泥”，故渐趋式微。到了清朝末年，学人身当时世之变，遂扇扬古风、会通西法，名学之义，乃复炳炳烺烺焉。然而揆测其论述之途，盖有三类：

第一种路向，是依西洋的文法语法之学来重建名学。亦即把名学视为建立语言规则系统的学问。代表著作是马建忠的《马氏文通》。循着这个路向，近代的中国语言学、语法研究，于焉展开。与西方自索绪尔以下之语言学传统也能直接联结起来。专门名家，如黎锦熙、陈望道、王力、许世瑛、张世禄、周法高等，著作宏富，已建立了不可动摇的学科新传统。

第二种路向，是依西洋哲学与逻辑研究之规模，来重建名学。亦即把名学视为主智的逻辑的心灵表现，认为墨家之墨辩，名家之惠施、公孙龙、邓析，皆具有“纯理论的兴趣”（冯友兰语），乃“一系相承之逻辑心灵之发展”（牟宗三语），试图用欧西逻辑语式，来重新诠释名墨旧文。代表人物是胡适、牟宗三等。循着这个路向，近代讲中国哲学史者，亦能与西洋哲学在近代重视语言研究的发展相关联起来。

第三种路向，是对中国传统文字训诂之学的发扬与重构。如刘师培、章太炎诸氏之论正名，皆绍承清儒诂经之学，兼采西洋语言学知识，予以系统化条理化。但这条途向，后来又分化为两路，一是重回清代训诂小学的格局，另一路则汇入依西方语言学语法研究而构建的语言学阵营中去了。

这些途向，甚为不同，各路向内部亦有严重之分歧，不同路数间彼此更是互相攻讦。我入大学时，所读淡江大学中文系，是许世瑛先生创办的。许

先生无疑为第一种路向在台湾之代表人，系中师友濡染宗风，从事语法研究者甚多。后负笈师大国文研究所，林尹、高明诸先生，师承章太炎、黄侃一派，以训诂小学为主，耳目心力所及，端在《说文》与《广韵》。此近代名学发展之第三种途径，而退返于清儒故墟者也。故彼时林先生等，皆颇以能绍清儒箕裘自矜，自谓为俞樾、孙诒让、章太炎、黄侃之嫡传。当时台大及“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诸先生亦好言语言研究，然自董同龢以降，取径皆与师大一派不同。偶相谈论，辄为双方之刺悖不相入所惊。而世之治哲学者，又对中文系之矜矜然于文字语言，颇有微辞。新儒家如牟宗三等，尤其鄙视师大的小学传统。我与新儒家一派过从论学，本极熟稔。对于两派的冲突，感触当然也很深。而当时却又有不满于新儒家者，颇采摭逻辑实证论之话头，自谓沿续殷海光之教，以台大哲学系为主。双方腹诽面诤，亦颇严重。其时我尚未能辨章学术之源流，遂以为此乃人事恩怨、派系纠纷使然。至今则逐渐明白这可能恰好显示了近代名学的几种不同发展。

而且这几种发展之所以互相诋诮，彼此不协，固由路线不同所致，实亦肇因于它们自身皆存在着甚多疑难。

例如依西洋文法语法研究而建立的语言学，事实上已使汉语语法的词、词类、句子、主语、宾语等基本范畴，历经几十年论争仍无法获得合理的解释。正如张世禄《关于汉语的语法体系问题》一文所说：“汉语语法学的建立，从开始到现在，已经快要一个世纪了。在这八九十年中间，研究和学习汉语语法的，几乎全部抄袭西洋语法学的理论，或者以西洋语言的语法体系做基础来建立汉语的语法体系”，以致在词类、结构形式、句子类型这三方面的洋框框，“好像是三条绳索，捆着本世纪的汉语语法学，使它向着复杂畸形的方面发展”（《复旦学报》，1980年语言文字增刊）。

所谓走入畸形复杂的死胡同，乃是指此种研究根本无法处理汉语的特殊语言现象，也无法通过这样的研究，建立一个语言学理论的规模。而且，在西方，语法研究向来可以直接关联于其形式逻辑之传统，因此，语言学可以跟哲学研究、文学批评密切联结起来，成为哲学解析和文学评论的基本方法，我们的语法分析却仅仅是语言学中之一支，完全无法延伸到逻辑思维的讨论上去，与文学研究亦无甚关系。

另一路语言学的发展，如章太炎所代表者，主要是传统声韵文字训诂之学的发扬，故其病不如前述之甚，但他们对西学也非无所因仍参考。像章太炎的“小学”，特点正在于对声音的强调。他批判古代的小学“引笔画篆，缴绕文字”“刻削文字，不求声音”。所以他要“作《文始》以明语原，述《新方言》以一萌俗”。换言之，他扭转了传统以文字为中心的小学（所谓“保氏教国子以六书”），从语言上去掌握文字。例如由语言之缘起，说明“同一声类之字，其义往往相似”；谓转注之“建类一首，同意相受”，类指声类，首指语基；并由声之转变，来解释何谓转注、何谓假借、何谓递衍等等，皆与汉宋明清人言小学者大异其趣。他讲声类、讲语基、讲声首，试翻其《国故论衡》上卷小学十篇（小学略说、成均图、一字重音说、古今音损益说、古音娘日二纽归泥说、古双声说、语言缘起说、转注假借说、理惑论、正言论），便知其所谓小学，乃是以语音为枢纽的。是通过对语言变迁的了解，来掌握文字孳乳发展的脉络。此非通达西方语言学，绝不能有此观念，亦不能有此术语。黄侃作《国故论衡赞》云：“侃以顽质，获侍君子，尝闻文字之本，肇于语言，形体保神，声均是则。晓微拗约，独能寻理。若夫探赜索隐，妙达神指：声有对转，故重文孳多；音无定音，而转注斯起。其犹二君所未逮乎！”正指此而言。

但反传统者往往因为必须自附于传统，故可能以新观点去错释传统，而又因他们自称是传统之发展，遂使后学者忘记了他们本来是反传统的，反而以保卫传统的方式来绍述他们。

如章太炎《文始·略例·庚》谓宋朝王圣美之右文说，是“字从某声，便得某意”。刘师培《字义起于字音说》更推溯于晋朝，云：“字义起于字音，杨泉《物理论》述取字，已著其端”。其实，据《艺文类聚》人部引杨泉之说，乃“在金曰坚，在草木曰紧，在人曰贤”，是就会意之关系说，而非由声音论字义起于音。王圣美的右文说，更与字音无涉。沈括《笔谈》卷十四谓：“王圣美治字学，演其义以为右文。古之字书，皆从左文，凡字，其类在左，其义在右，如木类，其左皆从木。所谓右文者，如戔，小也。水之小者曰浅、金之小者曰钱、歹而小者曰残、见之小者曰贱，如此之类，皆以戔为义也”，故所谓右文，是说字义往往可以从字的右偏旁得知，根本不

曾谈到什么“字从某声，便得某义”。章太炎、刘师培自己主张因声求义，主张因声言之变以考文字之孳乳，遂不免错述宗祫，推源于古人。否则岂能将古代以会意为主的文字学，扭转成以形声为主的文字学？所以这是总体文字学观念的转变以及方法的更新。固然尽章刘之术，未必便真能如章氏所期许的那样，“衡论国故、平章王教”，然而学者循其途向，自可生面别开，另树新帜。无奈继承者墨守师说，竟真以为章刘所说即是清儒诂经之法，即是古人小学之故辙，嫡传正宗，莫可移易。于是一种生猛有力的语言文字学之革新运动，渐渐地竟退返于《说文》的条例分析，以及声纽新变之争论之中，看不出具有什么革命性意义。而章太炎当时以发扬古代名学为职志的豪语：“小学者，国故之本，王教之端”，亦寢假而堕落成一工具性的入门学科，或独立分析文字音义而与其他学问渺不相干之术。

讲中国哲学史的先生们，对此学风，夙致不满。然以宋明理学来反对那些标榜汉学清学者，实亦为其表象所误，且夹缠于汉宋之争的历史阴霾中，未能得其总理。将名家之学，类比于逻辑问题，更是大错。故其论述墨辩名学之结果，并未如近代西洋哲学那样，将语言分析提升到一个方法学的层次；也未能理解到名学在中国学术文化中的地位。他们只是发潜德之幽光，表述了一些众所遗忘的名家墨家旧论题，并用一个理论（如牟宗三的“两层存有论”）来安置它们和宋明理学的关系而已。

这三种途向都未必能为中国名学打开一条生路，我自己的研究也不从此处问津。我是从文学批评的角度来处理这一问题的。

文学批评本来就要讨论到语文表现诸问题，早期王力《汉语诗律学》即对中国文学中的声律问题颇有析释。影响所及，在台如王忠林《中国文学之声律研究》、邱燮友《唐诗中使用和送声的现象》之类论著，亦沉沉夥颐。除了这些文学声律的研究之外，有些人透过修辞学，来讨论文学作品中的字句安排，如黄永武《中国诗学》，剖析诗中的倒装、实字、虚字、矛盾语法等。有些则参酌西洋语法分析之技，撰为专文，如高友工、梅祖麟《唐诗的语法、用字与意象》、梅祖麟《文法与诗中的模稜》、李文彬《变换律语法理论与文学研究》等。颜元叔运用形式主义结构分析，讲张力、反讽、字质，亦近于这一路。还有一些，则不从这些细碎局部的地方去谈作品的文